

神戸市外国語大学 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The Confucian sacrificial ceremony of the Yushima Seido in Tokyo

著者	秦 兆雄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The Kobe Gaidai Ronso : The Kobe City University Journal
volume	63
number	4
page range	35-54
year	2013-03-01
URL	http://id.nii.ac.jp/1085/00001390/

东京的汤岛圣堂与释奠礼¹

秦 兆雄

摘要：本文是一篇关于日本东京孔庙“汤岛圣堂”与释奠礼的人类学考察报告。笔者在参考相关文献与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汤岛圣堂及其释奠礼的历史演变，并通过田野调查，以斯文会在汤岛圣堂举办的2012年度释奠礼为例，具体考察了当今汤岛圣堂与释奠礼的规模、内容和形式，揭示了源自中国古代的孔庙建制与释奠礼在江户时代兴盛、明治前期衰退、明治后期复兴，进而在日本社会不断以本土化推进的历史概貌。以此实例更进一步地阐明了中日两国儒家文化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又存在着不可混淆的异同点。

一 前言

孔庙与释奠礼发源于中国古代，后来传播到越南、朝鲜半岛、日本以及世界各地。因此，在论述东京孔庙汤岛圣堂与释奠礼的历史与现状之前，有必要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孔庙与释奠礼的历史变迁与现状。

孔子去世后的第二年（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在曲阜阙里孔子旧宅立庙，改孔子生前所居三间房屋为寿堂，陈列孔子生前的生活用品，并按岁时祭祀，是为曲阜孔庙及祭孔传统的起源。

公元前195年10月，汉高祖刘邦到曲阜孔庙，以牛、羊、猪全备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同时封孔子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专主孔子祀事。这成为以后历代皇帝祭祀孔子的典范与开端。其后各地陆续出现了奉祀孔子的庙宇，至东晋则出现了国家建造的京师孔庙与孔氏家庙。唐贞观4年（公元630年），太宗下诏州县学校皆建孔庙，自此孔庙遍及各地，同时作为礼制庙宇的孔庙与地方官学结合为「庙学制」，形成了前庙后学、左庙右学、右庙左学及庙学分离等四种主要布局形式。

“中国虽然从唐朝贞观四年就令州县学校建设孔子庙，历代也不断下令建设维修孔子庙，但是，对于孔子庙的建筑形制历代却没有明文规定”（孔・孔 2011：181）。于是各地孔庙因朝代、建筑工艺、工匠水准不同以及地形、财力的限制，

1 本文部分内容曾以随笔形式发表在2012年5月22日的《国际儒学网》，本版进行了较大增补和修改。在资料收集过程中曾得到斯文会办公室宫田末子女士和岩井直子女士以及足利学校办公室孔佩群女士等工作人员的协助。特此鸣谢！

样式与规模差异很大,虽通常是三进院落,但也有许多只有两进(曲阜孔庙最大,为九进)。孔庙主要建筑一般有位于里院中轴线上的大成殿,位于大成殿正后方的崇圣祠(也称“启圣殿”,为主祀孔子之父叔梁纥之殿),连接大成殿正面两侧的东西两庑、杏坛、泮池²、大成门、棂星门等。

历史上孔庙不仅形式规模各异,而且名称多样。如上海的文庙、嘉定的孔庙、苏州的文庙、南京的夫子庙等。孔祥林等认为孔子庙是奉祀孔子庙宇的通称,应分为以下五类:第一类是国立各级学校奉祀孔子的庙宇,正式名称是文庙,无论中国还是朝鲜、越南以及日本,大部孔庙都采用此名;第二类是曲阜阙里的本庙,它因有庙无学而不属于文庙,又因国家为孔子长孙设置了专门的奉祀爵位并制定了祭祀制度而属于国立礼制庙宇,同时却又具有家庙的性质,故有专门的名称“至圣庙”;第三类是由地方官员为纪念并祭祀孔子而出资建造的庙宇,但没有列入国家祀典,即一般所称孔庙;第四类是建造在书院内奉祀孔子的庙宇,但国家并没有为它制定仪礼,可称作书院孔庙;第五类是孔子后裔建造的孔氏家庙,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浙江衢州孔氏南宗家庙,由国家建造并设置了专门的奉祀官位,与曲阜至圣庙类似,但其性质还是家庙,另一种就是世界各地孔子后裔建造的家庙,包括韩国乌山的华城阙里祠等(孔·孔 2011:3-4)。依笔者所见,也许把第五类中的孔氏南宗家庙与第二类并列更为合适,不过本文意不在此,故不对此做进一步讨论。

释奠是历史上在孔庙祭祀孔子的传统仪式。就语义而言,释与奠都有陈设、呈献之意,指的是在祭典中,陈设音乐、舞蹈,并且呈献牲、酒等祭品,以示崇敬之意。释奠原为古代学校的祭祀典礼,荀子在《礼论》中把“礼”最核心的内容归结为“天地”“先祖”“君师”三项,释奠即“三礼”中的“君师”之礼。周代官学中就有释奠先圣先师的礼仪,如《礼记·文王世子》所载:“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

周礼中的祀典还有释奠、释菜和释币等名目。释奠是设荐俎饌酌而祭,有音乐而没有尸;释菜是以菜蔬设祭,为始立学堂或学子入学的仪节;释币即有事之前的告祭,以币或帛奠享,不是常行固定的礼仪。

自汉武帝于元光元年(前134年)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学说一跃而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师大多由儒者担任,孔子也就成了帝王们尊崇膜拜的对象。但此时祭孔仪礼并不称释奠礼。

汉明帝永平2年(59年)开始在太学及郡县学祭祀周公与孔子。随后,汉明

2 泮池即半圆形水池,上有拱桥连通,意即“泮宫之池”。根据周礼,天子太学中央的学宫称“辟雍”,四周环水;诸侯之学,只可南面泮水,故称“泮宫”。因孔子在后世受封文宣王,因此以泮池为规制,修建于孔庙大成门外。同时泮池还具有防灾、调节气温及风水等象征意义。

帝又亲赴曲阜，祭祀孔子及72弟子，这是祭孔有配享的开始。祭祀孔子的礼仪称正献礼，祭祀配享者的礼仪成为分献礼。南北朝时期，太学内立有宣尼庙，每年春、秋两季的第二个月行释奠礼。隋开皇元年（581年），孔子被尊称为“先师”，国子监开始于每年四季中第二个月的上丁日祭祀孔子，这是丁日祭孔的开始。

唐朝初年，仍以周公为先圣，以孔子配享。唐太宗贞观2年，房玄龄上书说，周公和尼父都是圣人，而学校的建立是从夫子开始的，伏请停祭周公，升夫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从之。唐高宗显庆二年（657），礼部尚书许敬宗等奏议，周公践极摄政，辅助成王治国，功比帝王，应该配享成王才是，释奠礼当祭祀孔子。此后，孔子在国学祭祀中独享尊荣地位，释奠便成为祭孔典礼的专属名称了。

宋代是孔庙与释奠礼较隆盛的发展时期。宋太宗曾亲谒孔庙，制定以儒治国的方针。景德2年（1005年），宋真宗封禅泰山到了曲阜，谒孔庙，加谥“至圣文宣王”。宋仁宗庆历5年（1045年），又敕封孔子46代孙为“衍圣公”，这是孔子后裔世袭衍圣公的开始。宋天禧2年，始建曲阜孔庙的主殿。崇宁3年，宋徽宗赵佶前来曲阜，规定用“王者之礼”来祭祀孔子，并从孟子“孔子之谓集大成”之句中取“大成”二字，下诏将主殿更名为大成殿，而且亲笔提了匾额。此后，大成殿成了孔庙的象征，世界各地的孔庙也基本上如此。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释奠礼中的奉祀制度与祭祀制度，不仅对孔庙奉祀人物的增减和服饰、奉祀方法乃至奉祀人物的坐向等进行了制度化，而且明确了文庙的祭祀等级、名目、礼仪以及使用的祭品、音乐、舞蹈等，同时也因王朝的更替与儒学的发展进步，不断对奉祀制度与祭祀制度中的行事规范逐步进行修改和完善。

尽管释奠礼的程序和规格随着朝代的更替而变化，同时因地区的差异呈多样性，但通常都具备四个基本程序：①迎神；②三献礼（初献爵·亚献爵·终献爵、进饌奠帛与奉读祝文）；③饮福受胙（人神共享酒肉祭品）；④送神与望燎（焚烧祭文与丝帛等祭品）。而“奏乐是释奠礼的特色之一，因为孔子特别喜欢音乐”（フーブラー&フーブラー2003:134），因此四个基本程序及其所有仪式进行时都要演奏相应的古典乐章。

自汉代以后，历代皇帝几乎每年举行释奠礼，规模也逐步提升，明清时期达到顶峰。尤其清顺治定都北京后，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在京师国子监立文庙，内有大成殿，专门用来每年举行释奠礼，祀礼规格又上升为上祀，奠帛、读祝文、三献、行三跪九拜大礼，以祭天、地、社稷和太庙的同等规格来祭祀孔子。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因新文化运动、内战以及日军侵华等原因，虽然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民间释奠礼，但国家释奠礼只举行过寥寥数次。1913年6月22日和次年9月25日，袁世凯先后颁发了“尊崇孔圣文”和“祭孔令”，并于1914年

9月28日按照前清的祀孔规定举行了民国以来第一次释奠礼。1915年2月,袁世凯通令全国学校恢复“尊孔读经”,宣布“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但很快遭到革命派与激进知识分子的抵制。直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之下,席卷成为否定儒家传统的革命浪潮。

1927年6月,国民党北伐成功,中华民国大学院通电各教育机关废止祀孔,其后蒋介石在提倡新生活运动的同时,积极开展恢复祀孔活动。1934年7月1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纪念孔子公告,规定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全国休假一天,全国各界一律悬旗志庆,各党政军警机关、各学校、各团体分别集会纪念,并由各地高级行政机关召开各界纪念大会。从此,祭孔的时间由过去的春秋丁祭改为孔子诞辰日祭祀并延续至今。1934年11月2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颁发了《孔子纪念歌》明令。1934年至1936年以及1948年教育部在曲阜以太牢举行祭孔仪式,但名称改为孔子诞辰纪念大典,而且程序和礼仪做了较大变动,如献爵改为献花圈,古典祭服改为长袍马褂,跪拜改为鞠躬礼。

1949年以后,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所有的释奠活动均被取消禁止,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大搞“批林批孔”运动,很多孔庙的文物古迹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直至改革开放之后,各地孔庙才逐步开始修复。曲阜至圣庙的修复工程从1979年动工,至1984年结束。1984年9月26日至29日,曲阜县政府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国际孔子诞辰故里游”文化经贸旅游活动,至圣庙也恢复了每年9月28日举行的民间祭孔活动。至2004年,“国际孔子诞辰故里游”被改为“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曲阜市政府于9月28日在至圣庙正式举行祭孔大典,不仅由市委书记献花篮,市长宣读祭文,而且中央电视台向全国直播了整个仪式,对全国各地传统孔庙的修复与释奠礼的恢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积极的推动力,全国各地陆续响应,开始了孔庙的修复与释奠礼的恢复活动。此后,曲阜至圣庙的祭孔大典规格也在不断提高。2007年,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又改为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由国家旅游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济宁市人民政府与曲阜市人民政府联合承办。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孔庙与释奠礼是国家统治者及其社会精英尊孔崇儒的象征的话,那么当代中国大陆各地孔庙与释奠礼的复兴现象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曾经被否定过的传统儒学思想及其价值观被国家统治者以及社会精英阶层再次认可并逐渐受到推广的社会现状。事实上,这一点早已引起中日学术界的关注(中島 2008; 张 2011),本文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考察和讨论汤岛圣堂与释奠礼的历史变迁与社会现状的。需要说明的是,有关这方面的介绍虽然在一些学术著作以及因特网上可以看到,但各有偏重,不够深入全面。比如,铃木三八男(1989)偏重介绍了汤岛圣堂初期至明治时代释奠礼的一些故事情节;駱承烈(2009)考察了汤岛圣堂但没有涉及释奠礼;孔祥林与孔喆(2011)运用历史资料介绍了汤

岛圣堂与释奠礼的历史变迁，但没有做实地考察。而且，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关对当今汤岛圣堂与斯文会举办的释奠礼进行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综合性考察报告。因此，本文试图弥补上述缺陷，揭示源自中国明朝孔庙建制与释奠礼在江户时代兴盛、明治前期衰退、明治后期由精英阶层支持而复兴、进而在日本社会不断以本土化推进的历史概貌。以此实例进一步阐明中日两国儒家文化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又存在着不可混淆的异同点。

二 汤岛圣堂与释奠礼的历史概况

汤岛圣堂座落在日本东京都文京区汤岛一丁目“御茶之水”车站附近，始建于儒学在日本全盛并确立统治地位的江户时代（1603-1867年）早期。

宽永7年（1630年），德川幕府的儒臣、朱子学派创始人林罗山在尾张藩主德川义直的资助下，在上野忍冈（现在的上野公园）的林家私邸里创办私塾，宽永9年冬在私塾旁创建了孔庙，供奉孔子与四哲像，命名为“先圣殿”，宽永10年（1633年）2月10日（丁日）在先圣堂举行第一次释菜礼（供品为蔬菜、无牛羊等牺牲。堀 1990:281；铃木 2012:139）。同年4月17日，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到先圣堂参拜孔子与四哲，并命林罗山讲述《尚书 尧典》，于是在宽永12年（1635年）2月举行的释奠礼上，林罗山首次讲经《论语》第一章。此后几乎每年举行丁祭，并在万治2年（1659年）作为定制确定下来（铃木 1989:1-4）。

万治3年（1660年）12月，幕府拨款让林罗山之子林春斋对文庙进行改修扩建，至次年6月竣工。新文庙方位向由坐东朝西改为坐北向南，殿前的正门称为杏坛门，外门取名为“入德门”（意为进入此门可学到孔子提倡的儒家道德），文庙建制基本形成。此外，宽文4年（1664年）丁祭时，林春斋首次请伶人吹奏古乐，视为恢复中国周代古典礼乐之举，并于宽文10年（1670年）举行释奠礼时首次在东庑设定了伶人的座位，规定此后释奠礼必须演奏古乐，使释奠礼仪得到了基本的完善（铃木 1989:4-5）。

元禄3年（1690年）7月9日，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命令林春斋之子春常将孔庙及私塾搬迁至汤岛现址扩建。竣工后的正殿上方挂上了由纲吉将军亲笔书写并涂为黑漆金字“大成殿”的匾额，殿内梁柱以及杏坛门全部涂朱漆，两庑等处则涂朱，绿、蓝等构成的彩色，并在杏坛门外增建了没有装饰涂色的仰高门（“仰高”来自《论语·子罕》：“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句，以示对孔子及其儒学的崇高敬仰）。且因幕府同年11月16日取孔子故乡昌平之名将新庙东面一块斜坡命名为昌平坂，所以新庙又被称为昌平坂圣堂；同时因新庙所处汤岛地名，故也被称作汤岛圣堂（铃木 1989:8-10）。这就是汤岛圣堂的来历。

为了表彰林家三代对幕府推广儒学所做的贡献，元禄4年（1691年）正月13

日，幕府为林春常封爵任官，称为“从五位下大学头林信笃”，世代相袭大学头官职，成为圣堂的祭主。此后主持释奠礼成为林氏家族的公职，而由林罗山开始一直担任的“侍读”、外国事务以及法制起草等职位事务也代代世袭。同年2月11日，在圣堂大成殿举行首次释奠礼，纲吉将军登上大成殿，奉献神剑，焚香拜礼后退居杏坛门临时建筑内观看释奠礼，逐年依序。即从元禄6年（1693）开始每年举行春秋两次释奠礼，春季将军列席，秋季允许诸大名参观成为惯例（铃木1989:11-12）。

至宝永7年（1710年）8月4日，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采纳家臣新井白石关于释奠礼中礼服应遵循周制、而当时朝廷的黑漆帽源于周代等考证意见，首次头戴黑漆帽，身着名为“直垂”的武士礼服登上大成殿，用神道仪式祭拜孔子（铃木1989:16）。这实际上就是从林罗山首次举行释奠礼以来沿用的明代儒式仪礼被日本神式取代的开端。

宽政9年（1797）年12月，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正式将主要由林家经营管理的汤岛圣堂收归幕府作为“官学”，主要用于教育德川幕府的直属家臣“旗本”于武士家族“御家人”的子弟，并将其更名为“昌平坂学问所”，直属幕府管辖，并将其整修扩建，成为幕府的最高学府，俗称“昌平黉”。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与昌平坂学问所这一正式名称相比，人们更习惯称之为汤岛圣堂，并一直延续至今。

宽政10年3月，幕府参考明朝遗臣朱舜水当年为水户藩主德川光圀制作的孔庙模型，再次对昌平坂学问所进行大规模扩建。至宽政11年（1799年）10月竣工时，庙宇及全部校舍总面积达1500坪（4540平方米），以前涂有朱漆的建筑部分也统一涂改为黑漆。宽政12年（1800年）2月在此新庙首次举行释奠礼时，将一直使用的明代礼制废除，改为延喜式³规定并有所简化（铃木1989:25-28），正式按神道礼仪举行释奠礼。

明治维新后，幕府的昌平坂学学问所由新政府接管，并改称为大学校或大学。但明治四年（1871年），明治政府将大学校废除，设文部省（教育部）于其址，又将其中大成殿建成博物馆（日本历史上最初的博物馆，即今东京国立博物馆），至此，昌平坂学问所的儒学传统与正统地位基本结束。

明治5年（1872年），文部省与博物馆分别搬迁至霞关与上野，汤岛圣堂遂改为东京师范学校和书籍馆（日本历史上最初的图书馆，于1947年改为国立国会图书馆），明治7年（1874年）又于其中增设东京女子师范学校。东京师范学校与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先后于明治19年（1886年）和明治23年（1890年）升格为高等师

3 《延喜式》是延喜五年（905年）由醍醐天皇命令藤原时平等人制定编写、康保四年（967年）颁布施行的一套律令，其中对官职与祭祀礼仪有详细规定。

范学校，后来分别发展成为今天著名的筑波大学（后来搬迁至茨城县筑波市）与御茶水女子大学（后来搬迁至文京区大塚）。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将昌平坂学问所的教育、研究机构和主管天文的天文方（后来的开成所）以及主管医疗的种痘所（后来的医学所）合并，成为东京大学的前身。其次，昭和3年（1928年）10月，政府还在此创办了东京高等齿科医科学学校（今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由此可见汤岛圣堂在日本近代教育史上发祥地的地位。

明治13年（1880年）6月6日，斯文学会在东京成立。“斯文”二字取自《论语·子罕》，学会以此命名即有传承孔子思想之意。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职员中有志之士为了表达对孔子教化日本国民的谢意，于明治39年（1906年）10月10日结成孔子祭典会。由47人组成的发起人会议于11月28日和次年1月16日分别两次召开，制定了会规与祭孔仪式，选举了由20人组成的评议会与10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决定将每年4月第4个星期日定为祭祀孔子的释奠日，而释奠礼基本上沿袭德川时代后期采用的神道仪礼。明治40年（1907年）4月28日（周日），会员达693人的孔子祭典会在大成殿举行了明治维新以来首次释奠礼（孔子祭典会1907：2-25）。当时祭主为从二位勋一等男爵细川润次郎，神职人员来自根津神社、富冈八幡神社、神田神社等附近14个神社。释奠礼改称“孔子祭”，礼毕后下午1点由知名人士在讲堂内举行以宣传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讲演会。这些以后成为惯例并一直沿用至今。

大正7年（1918年）9月27日，斯文学会与孔子祭典会合并，成立财团法人斯文会，并从大正9年（1920年）开始至今，一直负责管理汤岛圣堂并组织主办释奠礼等一系列传承传统儒学的文化活动。

大正11年（1922年）3月7日，圣堂成为“国家指定史迹”，属于文部省辖管的国有财产。但大正12年（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使圣堂基本被焚，孔子像也不幸罹难，仅“入德门”幸存。现今所见之汤岛圣堂，是后来在斯文会主持下，由著名工学博士、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伊东忠太负责设计，仿照宽政年代的建筑式样用钢筋水泥于昭和10年（1935年）重建完成的，并于1986-1993年间进行了大规模整修。

三 当今的汤岛圣堂与斯文会

汤岛圣堂北面偏西约1.5公里便是东京大学本乡校区，笔者从1986年4月开始在这里攻读文化人类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期间虽曾骑自行车到汤岛圣堂参观过两次，但正逢大规模整修（从1986年开始，1993年3月竣工），加之资料文献的局限当时未能详细考察。笔者1994年3月自研究生院毕业后，一直侨居神户市，以致研究搁浅。

2008年8月24日至9月3日间，笔者应台湾“三民主义大同盟”等民间团体

之邀，参加了由长崎县立大学祁建民教授率领的“2008年中国大陆旅日学者来台参访团”，期间有幸与时任“中华民国爱盲协会理事长”、“团结自强协会常务理事”的严长庚先生相识，并由他得知，1975年4月，严先生在担任台北市城中国际狮子会秘书长期间，曾亲自组团从台北将一尊当时世界上最高大的孔子铜像运往东京的汤岛圣堂赠送给斯文会。在盛大的赠送仪式后，他所率领的代表团80余人又与斯文会成员一起参加了当时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释奠礼，其中来自台北市大龙国民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还现场表演了八佾舞。

不仅如此，笔者自台湾返回不久，便十分惊喜地收到了严长庚先生用航空信寄来的两部自传《耳顺集》与《随心集》。在《随心集》第143-154页中，严先生详细地介绍了台北市城中国际狮子会向汤岛圣堂赠送孔子铜像的目的及其作为负责人积极参与的这段历史，《耳顺集》则留存了当时拍摄的两张集体合影。

可谓机缘巧遇，与严长庚先生的邂逅，不仅让我对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这段历史过程有所了解，而且对汤岛圣堂也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而实际上，笔者由于专业方向和兴趣所致，一直以来都对中日两国日益兴起的儒学复兴动向有较多关注，并尽己所能地积极参与了许多相关活动⁴，因此对汤岛圣堂的考察可算是势在必行。

2012年3月31日，笔者经过事先联系约定，到设在汤岛圣堂内的东京斯文会馆拜访斯文会理事长石川忠久先生，终于有机会仔细考察了汤岛圣堂。

现在的圣堂比宽政11年扩建后的面积要小一些，占地13874平方米，但目前仍然是日本最大的孔庙。

从正门进入圣堂，左侧是仰高门，与右侧的斯文会馆紧邻。门外右侧树立的方形石柱上一面刻有大字“史迹 汤岛圣堂”，另一面刻有“根据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护法，大正十一年三月内务大臣指定”小型字样。

进入仰高门，地势逐渐由低渐高，步行约250米，迎面是一棵高大的楷树，树

4 2009年是孔子诞辰2560周年，5月23-24日间笔者先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在日本石川县加贺市举办的亚洲地区孔子学院2009年联席大会，再于9月27-29日间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在中国曲阜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儒学大会与祭孔大典等系列活动，随后将这两次亲身经历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用日文写了一篇题为“从东亚看儒学复兴动向”的拙稿，于2010年3月4日发表在年刊杂志《宗教与现代2010》（平凡社）上。2010年4月1-5日，笔者还曾自费专程到中国曲阜考察，期间得到曲阜儒家联合会段炎平副会长、尼山孔子基金会孔庆亮干事与毕海鹰干事等同仁的协助和邀请，参加了由世界孔子后裔联谊会总会主办，有世界各地孔子后裔代表参与的孔子春祭大典；同时受曲阜师范大学之邀，作为祭祀官参加了在曲阜师范大学校内举行的曲阜各界尊孔人士祭孔春季大典等系列活动。2011年7月15-18日，笔者又作为主礼嘉宾应邀参加了在湖南省中华文化学院举办的第五届全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另外，2012年3月2-3日间，笔者于日本神户市接待孔子第78代孙、世界孔子后裔联谊会副会长、尼山孔子教育基金创办者孔众先生来访，并与孔先生就儒学和孔子文化等问题多有交流。2012年8月7-8日应邀参加了在北京由白鹿洞书院、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办，北京七宝阁书院承办的“第二届书院传统和未来发展论坛”。

下边木板上的说明文显示，这是大正四年（1915年）林学博士白泽保美从山东曲阜孔子墓旁的楷树上采来种子精心培育长大的。

楷树右侧约20米处（即斯文会馆后墙外）耸立着一尊巨大的孔子铜像，铜像脚下水泥基座上正面雕刻着“中华民国台北市城中国际狮子会敬立”，右侧雕刻着“关明德教授恭塑”，左侧雕刻着“台北·三本铸造工业社恭制”字样。靠放在铜像旁边的斯文会馆后墙的三块木板上，分别刻着当时的狮子会徐世彦会长撰写的“孔子铜像塑造记”与财团法人斯文会德川宗敬会长撰写的“孔子铜像建立记”，以及蒋中正先生书写的“有教无类”字样。

这些文字与严长庚先生的口述与著作完全一致，向参观者详细介绍了这尊铜像的来历和相关信息：铜像高达4.57米，重1.5吨，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孔子铜像；当时关明德教授执教于台湾师范大学，是雕塑名家；揭幕仪式在1975年11月3日举行，因为这天是日本于昭和23年（1948年）公布实施的法定节假日时确定的文化节，所以选择此日以表达斯文会以及文部省等日本有关机构对孔子这位传统文化巨人的崇高敬意。

从楷树左侧石径向前直行约300米，左侧是有4级台阶的入德门。门内为一小块平地，引人注目的是右侧有一谓之“水屋”⁵的小亭，四周没有墙壁，由四根木柱支撑、覆盖着铜瓦的屋檐下，是一座用水泥砌成的长方形水槽，有自来水供应。后来据斯文会馆图书管理员岩井直子女士介绍，圣堂初期所建水屋在昭和20年（1945年）4月13日东京遭受美军大规模空袭中化为废墟，现存水屋于昭和29年（1954年）重建。

入德门正面有一条约200米的平地通道与约300米的23余级台阶连接杏坛门。通道左侧接近台阶处有一棵不大的梅树，旁立石碑，碑文是：“斯文会总裁伏见恭博亲王殿下手植 昭和10年（1935年）”。

杏坛门前两侧植杏树数株，从左侧通道行约250米处为圣桥门，连接外面大道。而大道对面就是上文提到的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杏坛门前左右两侧还各放一口直径1米有余的方形水缸，里面盛满了水，火灾发生时可用其灭火。水缸与墙壁之间的台阶上竖立着一扇大木板架，挂满了木牌。木牌大小相同，上面都是各级考生及其家长为了考上理想的学校，向孔子求助许愿而写的祈祷文字。

杏坛门有三个入口并立，总幅宽20米，进深4.7米。入杏坛门就是东西南北对称的大成殿，东西两侧为庑，中间是用大石板铺成的庭院广场。大成殿的面宽20米，进深14.2米，高14.6米。每庑分为12间，面宽28.3米，进深4.7米，没有任何

5 “水屋”本来是日本神社寺庙内特有的小型建筑设施，通常称谓“手水舍”，位于神社与寺庙的参道旁，让参拜者参拜之前按照神道仪式规定“左右左”顺序洗手漱口洁净身心（“左右左”即参拜者用杓子取一瓢水依次洗左手与右手，将水倒在手心漱口，然后在洗一次左手，最后以杓子中剩下的水清洗杓子），这一礼仪顺次与后述修祓仪式一致。

陈列与装饰，宽敞明亮，举行释奠礼等仪式时可供参会者在此饮茶休息。后来据岩井直子女士介绍，大成殿占地总面积（包括庭院广场与两庑以及入杏坛门在内）为66108平方米，“床面积”（建筑面积）为37827平方米。

大成殿内外的颜色与杏坛门相同，均髹黑漆，歇山式建筑的屋顶亦与圣堂内其他建筑的屋脊相同，都镶嵌着贵重的铜圆瓦，年久铜锈成绿色（神社等高规格的建筑通常是铜圆瓦葺的屋顶）。大殿正中檐下悬金字匾额，上题“大成殿”，赭红地鎏金楷书，用长方形金色细线围框。匾额均匀巧妙地衔接着屋檐与殿面，在整个黑色的大成殿中显得特别庄重夺目。殿外正脊两端分别有两条吉祥动物“鬼狺头”（鸱尾）凌空坐镇。这是一种想像的神鱼，龙头鱼尾，双角双足，宽政11年（1799年）以铜铸造，每条重637.5公斤，作为水神守护大成殿，免遭火灾劫难。此外，大成殿两侧葺铜垂脊，四隅角还各有一只“鬼龙子”（嘲风）坐镇。这是一种想像的灵兽，猫形蛇腹（或曰豹形龙腹）并有犬牙，同样在宽政11年（1799年）以铜铸造，每只重93.5公斤，日夜警惕注视着大成殿四方，辟邪消灾。

参观了圣堂的主要景点后，按照约定时间，到斯文会馆理事长办公室拜访了石川忠久先生。石川先生生于1932年4月9日，虽已年至耄耋，但满面红光，举手投足神采奕奕。先生是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一直与孔德懋女士⁶保持密切联系，同时还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家，拜读了他的近期诗作后，先生还热情洋溢地说起自己对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传统文化复兴动向的关注。他告诉笔者，在进入21世纪后的日本，各界人士愈加重视儒学，并认识到大力推广普及儒家伦理道德来缓解日益严重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必要性，而汤岛圣堂以及他领导的斯文会肩负了这一历史重责，且坚持不懈地在努力着。

据先生以及斯文会宣传资料介绍，斯文会平成22年（2010年）6月1日由财团法人改为公益财团法人，目前拥有1200名会员，每年出版一期学术刊物《斯文》，并定期举办各种传统纪念活动。如1月1日至4日为“正月大成殿特别开放日”，元旦当天举行《论语》讲座，对外免费展示明朝遗臣朱舜水带至日本的孔子像；4月第4个周日举行祭孔仪式与纪念讲演会；5月第3个周日举行祭针灸仪式与纪念演讲会；10月第4个周日举行祭先儒仪式与纪念演讲会；11月23日举行祭神农仪式与纪念演讲会；每年1月和7月举办两次文化演讲会。此外，这里还继承了宽政九年德川幕府设立“昌平坂学问所”举办汉文讲座的传统，每周举办《论语》朗读、《论语》阅读、汉文入门、《孟子》讲读、汉字起源、《易经》讲义、阴阳五行说、素问讲读、《老子》讲读、《史记》讲读、十八史略讲读、汉诗

6 孔德懋（1917年-）系孔子第77代嫡孙女，第三十二代衍圣公（1935年改称奉祀官）已故孔德成先生的胞姐。现为无党派民主人士，全国唯一终身制全国政协委员。孔德懋女士热心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现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等职务。

作法入门、圣社诗会、江户汉学讲义、唐诗鉴赏、江户汉诗、古文书解读、书法、中国古典音乐、中国画、健康太极拳等各种文化讲座。

先生在兴致勃勃地给笔者介绍有关汤岛圣堂以及斯文会的历史与现状时，随即开封了一份刚收到的《第十届全国藩校峰会在水户》纪要，一边让笔者翻阅，一边介绍说，这是他今年2月18-19日作为“汉字文化振兴协会”会长在茨城县水户市与其他同仁一起负责主办全国藩校峰会的会议纪要，从平成14年（2002年）在汤岛圣堂举行第一届以来，全国藩校峰会每年在全国各地原江户藩校⁷轮流举办一届，至今年第十届，已有35所藩校代表参加。

当笔者表示对斯文会宗旨的敬仰和对其纪念活动的兴趣时，先生便诚邀笔者加入斯文会，并愿作为笔者的入会介绍人，笔者欣然接受。最后先生还建议笔者参加今年4月22日在汤岛圣堂举行的“孔子祭”（释奠礼），按规定不收参会费但交通食宿费自理，笔者由衷感谢并期待成行。

石川先生儒雅大方，极具亲和力。博学多闻、侃侃而谈、学问事理尽在其间。我们交谈愉快，气氛融洽，时间流逝得也特别快，不觉已近正午。告辞前与先生一起在理事长办公室和室外的孔子铜像前合影留念。最后，当笔者告知只看到了神农庙的标志时，先生便特意带我到了座落在大成殿东北墙角外一隅、因没有铺设石径而鲜为人知的小型神农庙前参拜了神农⁸。

四 2012年度汤岛圣堂释奠礼

在按斯文会有关规定填写了相关表格并缴纳年度会费后，笔者很快便收到了斯文会事务局发来的会员认可通知以及释奠礼邀请函，并于4月22日上午9点半左右便到达汤岛圣堂参加了盛典。

笔者到达时，已有不少来宾和市民陆续来到。斯文会馆的工作人员在杏坛门口两侧设置了服务台，向每位来宾以及参会者免费分发一份介绍释奠礼的说明书（包括祭孔的历史和主要内容、仪式程序表、孔子颂德之歌、祭文以及斯文会的由来与宗旨）以及当日所讲经文——《论语》先进篇第十一「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的原文拷贝和参考资料。

7 在江户时代，拥有一万石以上的领主“大名”均称作藩主，藩主家臣称为藩士，各藩创办的教育机构即藩校，规模与教学内容多样，许多藩校模仿汤岛圣堂设有孔庙，庙学合一，通常是藩主与藩士的所有子弟强制入学，但不接收普通百姓子弟（后来也有对老百姓开放的藩校）。一般藩校的教育方针是“文武兼备”，学生7-8岁入学，先文后武，14至20岁前后毕业。习文的内容以朗读和书写“四书五经”为主，江户时代后期增加了“兰学”（经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洋科学）等，习武有剑术、枪术、柔术、射术、炮术、马术等。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共有276个藩，维新后新政府于1871年废藩置县，将大部分藩校废除，其他少数藩校则变为旧制初级中学。

8 据《汤岛圣堂略志》记载，元禄11年（1698）此处就开始建祠堂并祭祀神农像。但宽政9年（1797年）2月神农像被移至神田佐久间町的医学馆。现在的神农像是昭和18年（1943年）由木村家捐献，从此每年11月23日举行祭祀神农仪式。

进入杏坛门时，便可发现对面大成殿门前摆放着一个很高的花篮，上面写着：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冯寄台。

大成殿工作日关闭，只有在周末和节假日才对外开放⁹，而此时，大成殿的十扇门均已打开，免费欢迎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与斯文会会员以及市民自由进入。殿内正中高台带门的神龛内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子的小型铜像。孔子像左右两侧的两尊神龛里分别依次供奉着“四配”与“十哲”。左面高台神龛是“四配”（西）中的“宗圣曾子”与“亚圣孟子”，右面高台神龛中是“四配”（东）中的“复圣颜子”和“述圣子思”；左侧“西哲五位”依次是“先贤”郗公冉子、齐公宰子、徐公冉子、吴公言子、陈公颀孙子“神位”；右侧“东哲五位”依次是“先贤”费公闵子、薛公冉子、黎公端木子、卫公仲子、魏公卜子“神位”。

与在中国曲阜孔庙举行的祭孔大典不同的是，这里的释奠礼规模很小，在大成殿内举行。10点之前，来宾、斯文会会员以及市民陆续聚满，主礼嘉宾、身着白色礼服的祭官、伶人、祭主以及石川忠久理事长依次到达指定席位：主礼嘉宾席位在祭祀桌案右（东）侧，祭主以及祭官伶人席位在祭祀桌案左（西）侧、司礼站立在殿内中央入口处，石川忠久理事长席位则在司礼左侧旁边。

十点整，释奠礼正式开始。斯文会谣口明常务理事担任司礼，整个仪式按以下程序庄严有序进行：

- 1 参会者就坐
- 2 来宾就坐
- 3 祭主祭官伶人就坐
- 4 修祓 全体起立。
- 5 开扉奏乐警蹕 全体起立
- 6 奠币
- 7 奠饌奏乐
- 8 献茶 煎茶道松风花月流 高野枫石 家元
- 9 祭文奉读 德川恒孝名誉会长 全体起立
- 10 祭主拜 德川恒孝名誉会长
- 11 来宾拜
- 12 参会者代表拜 全体起立
- 13 来宾祝辞
- 14 撤饌奏乐
- 15 撤币

9 大成殿在周末和节假日对外开放时收费，大人门票为200日元，儿童免费。汤岛圣堂内的其他设施没有门票，一律免费。

- 16 闭扉奏乐警蹕 全体起立
- 17 祭主祭官伶人退场
- 18 讲经 东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 高桥均先生
- 19 孔子颂德之歌 二松学舍大学附属高中学生 全体起立
- 20 理事长致辞 石川忠久 理事长
- 21 祭主来宾退场
- 22 参会者退场

以上仪礼程序是一套日本神道仪式色彩浓厚的祭孔仪式。首先是第4项修祓。这是日本神道祭祀开始时首先必须实施的一种净身仪式：神官手执“大麻”面对鞠躬低头的受礼者，以“左右左”的方向来回晃动，意味这样受礼者身心上的污秽与罪过就会被祓除转移到“大麻”¹⁰上。此时，全体起立后，首先由年长且级别较高的神官向通常关闭的正面龕门行修祓礼，然后由年轻且级别较低的神官为主礼嘉宾、讲经讲师以及司会等主要参会代表依次行修祓礼。

第5项开扉奏乐警蹕即迎神礼也是值得注意的：全体起立后，由坐在祭主德川恒孝先生右侧的、来自神田神社的三位伶人调笙吹笛，奏古典雅乐。同时年长且级别较高的神官虔诚地向正面龕门鞠躬敬礼后，一边有节奏地发出“哦！哦！哦！”的三声警蹕，一边恭敬地将两扇龕扉先右后左徐徐启开，而警蹕之意即在告示所有参拜者：“至圣先师孔夫子大驾光临哦，请各位小心谨慎迎接”！龕扉里的孔子铜像不大，“高38厘米，宽13厘米，厚3厘米，头戴司寇冠，身着官服，青铜铸成，因日久天长，已呈黑色”（駱 2009：85），是明代遗臣朱舜水从中国流亡日本时所带的3尊孔子像之一¹¹

在孔子铜像前，几位神官协同合作，进入第6项奠币与第7项奠饌奏乐仪式（此两项与第9项相当于前述三献礼）。奠币即奉献给孔子的礼物，以前是5匹绢帛，后来改为称作“奉书纸”5束和纸，被绑成一卷恭敬地放入箱内。奠饌是奉献给孔子的祭品。因为大部分祭品早已摆好，所以奠饌奏乐的主要就是在伶人演奏的悠扬雅乐声中，神官们先恭敬地将放在祭祀桌案上备有各种祭品的器具盖打开，然后十分庄重地向孔子三度献酒。

值得注意的是释奠礼中的供品内容。2012年7月7日笔者再次访问汤岛圣堂时，宫田末子女士向笔者提供了此处释奠礼中规定的供品及其数量如下：

- 1）日本酒2升（带甜味的和烈性的）；
- 2）鳕鱼子7个；
- 3）咸鳕鱼（150-200克）；
- 4）枣（干果）50粒；
- 5）鸡胸脯肉300克；
- 6）菠菜1束；
- 7）酸橙7-10

10 “大麻”即神道祓除妖魔的神符之一，白木棒尖或杨桐树枝挂着“御币”。而“御币”通常是用白色的和式纸条折叠成若干之字形后串起来的一种币帛。

11 原是朱舜水为感谢柳川藩（现福冈县柳川市）儒臣安东省庵而赠送给安东之物，后辗转流入大正天皇之手，1925年圣堂修建后，由天皇赐给汤岛圣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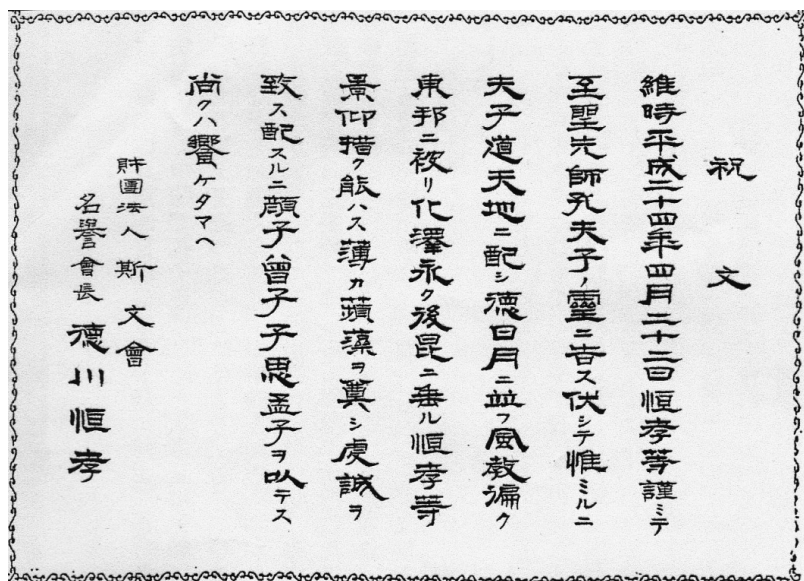
个；8）苹果7-10个；9）白米2-3“合”¹²；10）扁平年糕（白色）1块、加芝麻的扁平年糕（黑色）1块；11）活鲤鱼7条。

从表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汤岛圣堂释奠礼中供品种类也与通常神道仪式中的内容基本一致，没有中国传统释奠礼中规定的最高规格的三牲太牢（猪、牛、羊）等四肢动物的肉类。

另外，释奠礼结束后，笔者观察到表中7条活鲤鱼改为7张照片代替。关于这一变化，后来宫田末子女士通过邮件很遗憾地告诉笔者，历次的释奠中一直供有失去知觉的活鲤鱼，但自2011年3月11日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后，举国上下因此谨慎从事，所以2011年与2012年度的释奠礼中没有供奉活鲤鱼而改用照片代替，以示哀痛。

第8项献茶仪式由煎茶道松风花月流高野枫石家元完成。“茶道松风花月流”为日本煎茶道的主要流派之一；“家元”意为嫡派掌门人。高野枫石女士带领9位女弟子排成一行，将在西侧廊庑做好的茶点端至大成殿后，由高野枫石女士与其中两名弟子将茶点恭敬地摆放在孔子铜像下的案桌上。后来她告诉笔者，献茶仪式是近年石川理事长建议后由她开始负责实施的，今年是第15次，没有中断过。也就是说，此处的献茶仪式是从1998年度4月举行释奠礼开始的。

第9项德川恒孝名誉会长奉读祝文仪式看起来似乎与现在中国曲阜祭孔大典中的相似，而实际上有些差异。祝文系古体日文，简明扼要，扣人心弦。其体裁与内容通常固定不变，每年只需更改年月日即可，因为祭主很少变换。比如德川恒孝先生是德川宗家第18代“当主”掌门人，从平成元年（1989年）5月1日就



12 日本1合的体积相当于中国的0.1升。

任斯文会名誉会长后一直担任祭主至今。2012年的祝文原版¹³如前所示。

与此相比，中国从2004年正式恢复公祭孔子以来，每年在曲阜举行的祭孔大典上诵读的祭文虽然庄重有力，充满着对孔子伟大言行和贡献的敬意，但字句冗长，而且因为每年都请不同的名家撰文导致每年的祭文内容不同。

第16项闭扉奏乐警蹕即送神礼，与前述第5项相呼应。全体起立后，在伶人吹奏古典雅乐声中，神官虔诚地向正面龀门鞠躬敬礼后，一边有节奏地发出“哦！哦！哦！”的三声警蹕，一边恭敬地将两扇龀扉先左后右徐徐关闭，而警蹕之意则在告诉所有参拜者：“至圣先师孔夫子慢走哦，请各位一起欢送”！

第18项仪式是东京外国语学院名誉教授高桥均先生的讲经，持续了大约35分钟。可见上述林罗山于1635年首次讲经以后，每次释奠礼中都有讲经一项，成为传统，流传至今。

讲经仪式结束后，进入第19项仪式：全体起立，由二松学舍大学附属高中12名女学生组成的合唱团高唱《孔子颂德之歌》¹⁴。由于释奠礼前每位来宾以及参会者免费获得的资料中印有相关歌词，所以大家很容易也很自然地与学生合唱团一起合唱起来。赞颂孔子崇高美德的嘹亮歌声在大成殿内外荡漾，感人至深。唱歌仪式则与献茶式类似，属于近代日本发明创造，但历史比献茶式更悠久。发给所有参会者的歌词资料中注明：这首歌是在昭和2年（1927年）6月向市民公开募集的673首歌词中严选的，作者是下平末藏先生，由当时的东京音乐学校（现在的东京艺术大学音乐系）中田章先生作曲，一直沿用至今。

整个释奠礼大约持续了近一小时，虽规模不大，也没有警察在场，但井然有序，气氛素雅，令人肃然起敬。据斯文会会计主任宫田末子女士介绍，这次参加释奠总人数320名左右，其中来宾与斯文会会员以及二松学舍大学附属高中学生近120名，其余200余名为自由参加的普通市民及观光游客。笔者在人群中十分高兴地见到了来自史迹足利学校的前桥勋先生¹⁵，他带领着另外两名男同事代表史迹足利学校来参加。

大成殿释奠礼结束后，石川忠久先生邀请笔者前往大成殿西侧的廊庑去品尝

13 笔者试将此祝文译为：维平成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恒孝等伏惟谨告至圣先师孔夫子之灵：夫子道配天地，德并日月，风教遍及东邦，化泽永垂后昆。恒孝等满怀景仰之情，奠薄品以表虔诚，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尚飨！

14 歌词四章，为日语。孔祥林等译成汉语为“（一）泰山万世与云齐，泗水千秋流不息。孔子圣德与伟业，同样悠悠无尽期。（二）孝悌忠信操百行，圣道忠恕一贯之。修身齐家平天下，导源溯本仁字依。（三）圣道传至三岛，感化大和民心。开放美丽之花，缀成灿烂之形。（四）雄伟大成圣殿，耸立汤岛高岗。赐予人类幸福，映出和平辉光。”（孔·孔 2011:866）。

15 2012年3月29日，笔者曾赴东京郊外的栃木县足利市参观了被誉为日本最古老的学校—史迹足利学校，参拜了校内的孔子坐像，并拜访了该校事务所所长前桥勋先生与孔子第76代孙女孔佩群女士。

高野枫石家元为所有参会者免费提供的煎茶和日式点心¹⁶。

接着，石川先生带着笔者走到斯文会馆讲堂，聆听了从11点30分开始至12点30分，由“东京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原社长、“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原副会长樋口公启先生发表的题为“山田方谷 杂感”的专题演讲。山田方谷（1805-1877年）是德川幕府末期著名的儒学研究者、阳明学代表人物之一，曾提出过“理财论”以及“拟对论”，并积极参与了松山藩的藩政改革，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汤岛圣堂南面有一条河，名为神田川。南岸边座落着著名的政教会大圣堂“东京复活大圣堂”（通称是圣尼古拉大教堂），1891年竣工落成。所以此处连接两岸的钢筋水泥桥一直成为圣桥。圣尼古拉大教堂旁边有中餐馆“银座 Aster 御茶水宾馆”，这天下午1点开始，在餐馆里举行一年一度的尚齿会庆祝宴会，招待70岁以上的年长会员。宴会上，石川理事长致辞并代表参加者向满70岁、80岁以及90岁的主宾敬献了奖状与礼品。按规定，参加宴会的斯文会普通会员需缴纳参加费5000日元，所以通常出席人数不多。《斯文会会报》68期公布2012年出席人数为80名，而《斯文》第121号记载2011年度出席人数只有64名。宴会气氛和谐吉祥，3点终止。一年一度的释奠到此圆满结束。

此后宫田末子女士通过邮件告诉笔者，在此中餐馆举行一年一度的尚齿会庆祝宴会是从平成20年（2008年）才开始的。在此之前是请附近另一中餐馆“龙水楼”的厨师到汤岛圣堂来，在斯文会馆厨房或圣堂内庭院里将已经在释奠礼上供奉给孔子的活鲤鱼做成“中华料理”后，让参加尚齿会庆祝宴会的出席者一起分享。这是汤岛圣堂释奠礼中最后一项神人共食的传统仪礼习俗，即前述③饮福受胙，但现在形式与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被改变为在中式餐馆举行的尚齿会庆祝宴会了。

五 结语

在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以及社会精英阶层将儒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政治理念，景仰孔子并积极吸纳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精髓，所以当时的汤岛圣堂与释奠礼基本上仿照了中国明朝的建制与礼制并迅速发展。如圣堂的标志性建筑仰高

16 石川先生一边与笔者品茶，一边谦和地问起笔者的感想和建议。笔者首先十分高兴地告诉老先生，此次亲身感受到了日本神道式释奠与当代曲阜祭孔大典的异同，受益匪浅，衷心感谢；然后便不加思索地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斯文会至今还没有制作过有关介绍汤岛圣堂以及释奠等系列传承儒学文化活动的录像，是否可以开始准备制作相关DVD？这样既可做宣传，又可增加收益；二、中国大陆方面至今没有派过代表参加圣堂的释奠礼，而事实上两岸各地文庙近年已在以各种形式共同举行祭孔大典，以后是否可以邀请中国大使馆代表来参加？这样做一定会让孔子之灵感到欣慰。老先生听后连声答道“Good idea! 我本人完全同意，以后一定找机会将你的建议提交理事会认真讨论”。

门、入德门、杏坛门、大成殿等设施的名称来源、孔庙的多次改建、扩建并不断完善建制，最后成为中国传统的三进院落结构布局等历史都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传承儒家文化的行为和过程并不是全盘照搬中国，而常常是按照他们固有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有选择性地吸纳，或者根据时代的需要适当地进行取舍加工。比如历史上衣冠样式的改变、入德门内右侧“水屋”的增设、大成殿颜色的改变、以及于1800年开始的以延喜式代替明代儒式仪礼来举行释奠礼等一系列举措，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本土化倾向。

同时，中国传统释奠礼被日本本土化的倾向在明治时代后期恢复的释奠礼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如一年一度的释奠礼日期改为4月第4个星期日，神道式的修祓、开扉奏乐警蹕以及闭扉奏乐警蹕、献茶式与《孔子颂德之歌》等仪式的导入、以及奠币内容简化与饮福受胙的形式变化等都是其具体的表现。不过释奠礼中演奏雅乐与行三献礼以及讲经等儒家传统仪式一直保持下来，至今基本未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汤岛圣堂的释奠礼“可以说是神儒混合的祭仪”（陈2004:285）。

值得一提的是，讲经仪式在日本一直延续到现在也引起了国内部分学者的关注与反思。正如彭林与张德付所指出的那样，讲经本来是中国传统释奠礼中的重要仪式与内容，但是在中国大陆却没有传承下来，包括在当代曲阜祭孔大典中也没有得到复兴。因此当代中国的祭孔大典不仅应该增加讲经的环节，而且应该把名称由祭孔大典改为释奠礼（彭·张 2011）。不过，当代曲阜以及各地祭孔大典的时间统一为9月28日，各级领导和名家多次向孔子奉献高大花篮的隆重仪式（这可能源于中华民国后期的仪式改良），但汤岛圣堂的释奠中并没有出现，如台湾代表所献的高大花篮也没有被纳入此处的释奠礼中。这些又说明近现代中国变化中的祭孔大典对日本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上述儒学在日本的本土化过程既反映了日本精英阶层吸纳传承儒家文化的积极性、主动性与选择性，但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日本神道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的差异性。比如“水屋”的增设与修祓等神道仪式的导入，即反映了日本神道中独特的污秽意识；而儒式与延喜式的祭品规定的不同，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日两国传统饮食习俗的差异：自古至今中国人一直习惯食用四肢动物，故“三牲”无论对生者还是对死者都是最高佳肴；而日本历史上受佛教的影响天武天皇于676年颁布禁止杀生食肉的敕令（保护对象为牛、马、鸡、犬、猴，但不包括野猪与野鹿），江户时代幕府还排斥基督教及其食肉习惯而公开提倡佛教素食，因此在明治维新以前人们通常不杀四肢动物¹⁷食用而以食用鱼米蔬菜为主的传统饮食

17 一位稻荷神社的“神主”（神职人员）告诉笔者：至今野猪被称为“山鲸”，即山中鲸鱼；兔子被看作鸟类，用“羽”来计量。所以野猪与兔子例外，可食用。

文化(大塚 1993:7-12),因此由这一传统饮食习俗导致了神道祭祀仪式上仅供奉酒、米、鱼类和蔬菜水果等。

事实上,岩井宏实的研究成果表明,无论是古代《延喜式》,还是明治6年(1873年)3月公布的《官币诸社官祭式制定之件》,所严格规定的神饌内容主要是米、粟、酒、鱼类和蔬菜水果等,但因祭祀规格等级的大小而祭品数量不同。另外,《延喜式》明文规定神饌为熟食,而《官币诸社官祭式制定之件》规定神饌用生食,将神饌与活人平常吃的食物区别开(岩井 1999:170-174)。正如王蓉等所指出的那样,神社神饌是日本人日常饮食的一面镜子,反映了日本饮食文化的原型与特征(王 2007)。

与日本各地饮食习惯丰富多彩一样,日本各地孔庙与释奠礼的建制规模、礼仪形式以及相关内容的多样性。比如注15中提到的足利学校孔庙举办的释奠礼,虽然也和汤岛圣堂的释奠礼一样是神儒混合,但其中儒式要素要更多些:不仅有儒式的跪拜,而且祭品中还有牛肉¹⁸。另外,从因特网上可以看到佐贺县多久市的多久圣庙举行的传统释菜礼虽然有同于足立学校孔庙的儒式跪拜,但祭品却与汤岛圣堂的近似,即甜酒、银杏(或枣)、栗、芹菜、竹笋等蔬菜以及野鸡肉(或鲫鱼)、米饭、年糕等。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神儒混合是日本各地释奠礼的共同点,但由于各地孔庙与释奠礼的起源、历史发展变化以及地方传统文化变迁不同等原因,神儒混合的程度也有差异,呈现出多样性。

另外,汤岛圣堂举行释奠礼的日期与日本其它各地孔庙也不一致。如足利学校孔庙为每年11月23日(文化节),冲绳县的久米至圣庙与当代中国大陆一样为9月28,而多久圣庙自从1708年竣工以来至今仍然持续保持中国传统的一年春秋两季的释菜礼,而时间分别为即每年4月18日与10月的第4个星期日。

如果把本文所揭示的有关汤岛圣堂与释奠礼在江户时代兴盛、明治前期衰退明治后期获得精英阶层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复兴、进而在日本社会不断本土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孔庙与释奠礼从汉代至清代兴盛、中华民国初期开始逐渐走向衰退、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时期深受打击而改革开放后又逐渐获得精英阶层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复兴以及在中国大陆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轨迹相比较并进行讨论,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也许我们由此可以归纳出孔子与儒家思想在中国和日本历史上所扮角色的规律性:“革命”动乱时期被无情打击并全面否定,而新政权相对稳定后的和平发展时期则被用来恢复并维护社会秩序。

尽管这个大问题已经超越了本文的主旨范围,但本文所论述的汤岛圣堂与释奠礼的历史变迁及其兴衰史则显示出:如果说孔庙与释奠礼的兴盛是国家统治者及其社会精英尊孔崇儒的象征,即也是社会繁荣、和谐发展的标志之一的話,那

18 根据孔佩群女士向笔者提供的2011年度足利学校“释奠略式序次”。

么经过强大的欧美近代文明冲击洗礼后逐渐由日本社会精英阶层自发组织而得以持续复兴的汤岛圣堂与释奠礼，则充分反映了源自中国的儒家文化（文明）不仅与欧美的基督教文化（文明）之间有着继续共存、互补乃至共同发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而且还有着自身不可忽视的普世价值及其坚韧顽强的生命力。

以上只是对汤岛圣堂与释奠礼所作的初步人类学考察，有关汤岛圣堂与释奠礼的历史演变以及社会现状还需要今后在进一步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同时对中国各地与日本其他孔庙与释奠礼的历史变迁与社会现状，以及源自中国的儒学在日本变成“儒教”的本土化过程也要进行比较研究¹⁹。这是本研究的遗留问题，也是今后要进行更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与方向。鉴于此，本文力图通过上述探讨，为今后展开该领域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日文

- 岩井宏實 1999「神饌にみる日本化した外来食」毛直道監修『「講座 食の文化」第二巻日本の食事と文化』170-185頁、財団法人味の素食の文化センター。
- 内山知也・本田哲夫編 2001『湯島聖堂と江戸時代』東京：斯文会。
- 大塚滋 1993『食の文化史』東京：中公新書417。
- 加地伸行 1995『沈黙の宗教：儒教』東京：筑摩書房。
- 孔子祭典会編 1907『孔子祭典会々報』第一号。
- 公益財団法人斯文会『写真と図版で見る史跡 湯島聖堂』。
- 公益財団法人斯文会 2012《斯文》第121号。
- 公益財団法人斯文会 2012《斯文会会報》Vol. 68。
- 秦兆雄 2010「東アジアからみた儒教復興の展開」『宗教と現代がわかる本2010』146-149頁、東京：平凡社。
- 鈴木健一 2012『林羅山一書を読みて未だ倦まず』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
- 鈴木三八男 1989『聖堂物語—湯島聖堂略志—』東京：斯文会。
- 中島隆博編 2008『中国伝統文化が現代中国で果たす役割』東京大学グローバル COE「共生のための国際哲学教育研究センター」。
- フーブラー，トーマス&フーブラー，ドロシー（鈴木博訳）2003『儒教＜シリーズ 世界の宗教＞』東京：青土社。
- 堀勇雄 1990『林羅山』東京：吉川弘文館。

19 事实上，江戸时代以林罗山为代表的精英阶层吸纳中国儒学并把它作为治国良策时，提出了神儒合一论（堀 1990: 410-420），但相对于中国人对“孝”的强调，更重视“忠”（加地 1995: 112-113; 歴史の謎を解く会2005: 48）

山下龍二 2001『儒教と日本』東京：研文社。

歴史の謎を探る会編 2009『常識として知っておきたい日本の三大宗教：神道・儒教・日本仏教：ルーツから教えまで、その違いがよくわかる本』東京：河出書房新社。

中文

秦兆雄 2012“汤岛圣堂与释奠礼”《国际儒学网》国际儒学联合会。

陈玮芬 2004“近代日本汉学的庶民性特征——汉学私塾、汉学社群与民间祭孔活动”《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第四期251-286页。

孔祥林・孔喆 2011『世界孔子庙研究』（上下）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

駱承烈 2009『漫步孔子文化圈』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彭林・张德付 2011“关于‘祭孔大典’的建议：名称宜改为‘释奠礼’《光明日报》10月31日。

嚴長庚 1994《耳顺集》台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非売品）。

2004《随心集》台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非売品）。

王蓉 2007“神道神饌——日本食文化的原型”《民俗研究》第3期：156-168页。

杨义堂编著 2009《祭孔大典》山东教育出版社。

张志强 2011“传统与当代中国——近十年来中国大陆传统复兴现象的社会文化脉络分析”《开放时代》第3期：34-45页。